

• 专题研究 •

对日受降时期中共与苏联关系考察^{*}

周 锦 涛

摘 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对日受降问题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考虑到自己在华的特殊利益，苏联明确支持国民党的合法受降。但随着美苏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美国与国民党密切行动威胁到苏联远东战略利益与在华特权，苏联逐渐调整对华政策，虽然在名义上仍认可国民党的合法受降，但实际对其接收东北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抵制措施，同时加大了对中共武装进入东北的支持力度。中共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借助苏联与国民党、美国方面的利益矛盾，适时调整受降战略，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东北战略目标与对国民党斗争的主动权。

关键词：对日受降 中共 苏中关系 国共之争

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形势的鼓舞，1945年4、5月开始，国共两党向日本发起大规模攻势，取得了对日作战的主动地位。8月上旬，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与苏联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为了垄断战后对日受降权与巩固在全国的独裁地位，国民政府在失去相当国家权益的基础上，与苏联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①（以下简称《中苏条约》），从而获得从苏联全面接收东北主权与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作为抗战胜利的一支决定性力量，中共理应享有参与对日受降的合法权利，并制定了在全国对日受降的战略部署，但很快因来自国际国内的政治压力，不得不变更受降战略方针与政策。然而，苏联出于多方面的利益因素考虑，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具有多重性。这种态度的不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国共两党对日受降之争的走向。

目前对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的受降战略及国共两党与苏联的关系等相关研究，虽已有一些代表性成果，^②都详略不等地涉及相关内容，反映了美苏格局下国共两党争夺对日受

^{*} 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修正意见，谨致诚挚谢忱！

①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国民政府与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其中包括：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30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收复区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苏联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华民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国民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② 主要有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汪朝光：《进退之间的博弈：战后东北苏军撤离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于化民：《对日受降权争端背景下的中共与美关系》，《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等等。

降主导权,但由于相关核心档案史料的缺乏,其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仍然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对日受降为线索,对照相继解密的中、苏档案,试图对此期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探讨,以期此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苏联对华政策与中共全国受降战略的调整

为了推动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尽早对日作战,1945年2月初,美英与苏联签订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苏联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为建立巩固的远东安全线,执意支持外蒙古独立并独享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从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判中可以看出,宋子文尽力回避外蒙古问题,认为这“无异于动摇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但斯大林坚持“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随时面临着丧失的威胁”,并警告“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关于大连港口,宋子文认为应向所有国家开放,行政权属于中国,但斯大林认为“港口的负责人应当是俄国人”,中东铁路所有权归苏联。当宋子文感叹“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甚至比中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还要多”时,斯大林明确回答:“可能吧,关键是大连和旅顺口都是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确保苏联在上述两个港口的权益而修建,并因此具有了重大的战略意义。”^①

可以说,苏联对华政策与态度主要根源于其在远东的国家安全与在华特殊利益。因此,在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及维持苏联在东北特权的基础上,斯大林表示完全支持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我们有必要给予中国帮助的话,那么这种帮助一定是给蒋介石政府”,“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要这样做”。^②为了保证苏联兑现承诺,7月10日,宋子文代表团专门写信给苏联政府,要求苏联对中国东北主权、中国共产党及新疆等三方面的协商条款“提供相关书面保证”。^③

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事实上苏联对国、共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矛盾不断,双方经常在媒体上甚至当面相互指责。1945年6月7日、19日,白崇禧两次拜访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指责新疆武装冲突事件中的核心力量是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而在苏联报纸关于中国的诸多报道方面,“过多地使用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情报消息”,“观点非常偏颇”;^④7月9日,宋子文在与斯大林谈判时也认为,“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诋毁中国政府的文章,而此举当然不会对中国政府有益”,“希望苏联政府能对这些报刊加以限制”,斯大林当即反驳,“中国报刊上也写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的东西”。^⑤对于国民党,苏联认为其习惯于一党专政,排斥异

①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绝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50、51、52页。中东铁路于1945年8月苏军驻扎中国东北后改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1952年12月完全由中国收回。

②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绝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63页。

③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68页。

④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机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45页。

⑤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绝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68页。

党，不仅仅从政治上限制中共，而且在地方推行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尤其“由于新疆发生的起义事件，反苏宣传活动仍在继续着”。^①

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一则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因素及过去长期合作的基础，二则最主要的是，苏联对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并不信任。即使已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条约》，但苏联仍认为需要推动中共从政治、军事上全面制衡国民党，才能保障其在华特权。因此，在美国与国民党代表面前，苏联总是尽力撇清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但又不时赞美中共，给美国与国民党以暗示性警告。如莫洛托夫曾告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斯大林也认为，中共军队在抗日过程中表现英勇，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②彼得罗夫也表示，根据中共七大会议内容与《新华日报》判断，中共的立场与目的就是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与加强反日斗争。^③这些表态对中共来说是有利的，一方面，从国际上肯定了中共战后在中国政治上的合法地位。苏联迫使赫尔利等人不得不承认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④中共领导者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努力追求变革”，决定力图改变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抱有的偏见”；^⑤另一方面，从国际上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在国内开展政治、军事斗争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在苏联面前，赫尔利不得不承认绝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的事情中国自己处理，国共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⑥当然，受《中苏条约》制约与避免国际口实，苏联领导人不得不禁止对中共直接的公开支持与相互联系，但其实际态度与在华苏军的表现势必对国共的受降之争产生重大影响。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这给中共以极大鼓舞。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⑦在收到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后，10日晚，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受降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11日，中共中央指令全党务必明晰目前受降阶段的主要任务，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投降。同时，有鉴于国共力量对比，中共将夺取大小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重心放在华北与华中，而“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⑧

在8月13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认为“日

①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20—21、23页。

②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27、30页。

③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机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43页。

④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30页。

⑤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机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35页。

⑥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机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4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9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确定必须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9页。

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批评了国民党及中共内部存在的对美国原子弹作用过分夸大的观点，强调“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的作用。对于国民党，毛泽东严厉批判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是“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坚持独裁与内战的刽子手。同时提醒必须做好一切准备，自力更生，从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去解决问题。^①

8月15日，日本电台广播日本天皇裕仁投降诏书，美国总统杜鲁门竟然指令蒋介石独享在中国（除满洲外）受降的权利。与此同时，国民党代表公开指责中共违反蒋介石的命令。但中共坚持自主对日受降方针，同日，朱德发出责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命令，“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②同时朱德在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指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不打敌伪，保持实力，准备内战”的本性，希望美、英、苏三国支持中共的合法受降权。16日，毛泽东以朱德名义再次致电蒋介石，严正申明中共在自己作战范围内对日受降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针对14日蒋介石来电邀请自己去重庆谈判一事，毛泽东回电必须等受降权等事端解决以后才考虑会见问题。

为了增强自身力量、扩大影响，中共决定以攻占日伪盘踞的大城市为主要目标。8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同时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③

然而就在此日，中共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是蒋介石第二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会谈；另一份来自苏共中央，主要内容是“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④苏共电报在中共中央内部产生重大反响，因为这完全有悖于中共战后受降战略，“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⑤但经过全面权衡，中共决定终止上海起义计划。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指出：“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⑥

8月22日，美国方面就中共16日说帖回复，美、英、苏三国已一致同意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接受在华日军的投降。美国政府希望共产党能与蒋介石充分合作，这实际上公开拒绝了中共合法受降的要求。^⑦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会谈。同时，苏联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仍然坚持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和谈，同时承诺保证毛泽东等人在重庆的安全。^⑧

8月22日，毛泽东重新审阅并修改了中共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稿，他在指示中指出，苏联受《中苏条约》限制，不可能援助我们，“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1134、1124页。

② 《朱德总司令关于责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命令》（194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30页。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3页。

⑤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26页。

⑥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9页。

⑦ 于化民：《对日受降权争端背景下的中共与美关系》，《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

⑧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26页。

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①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愿意去重庆谈判。

8月2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认为中共军队已经在自主受降中取得很大成绩，控制了175个大小城市，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张家口等诸多重镇，“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同时指出参加重庆和谈与适当让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否则，“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②

二、苏军态度变化与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受降战略的制定

对中共来说，东北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能顺利占领，就可以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扩充武装力量，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否则一旦被国民党占领，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的被动局面。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多次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③

为了加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8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晋察冀两分局电：“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④ 冀东三个军分区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进军，同时电令山东分局，让万毅领导的东北部队做好出发东北的准备。19日，毛泽东致电贺龙、林枫，决定由林枫带领东北干部1200人从延安出发开赴东北。

8月20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分局，决定派遣万毅率领四个团、吕正操与林枫率领五个团尽快做好准备开赴东北，并要求每团官兵不得少于1500人。22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分局电中指出，虽然苏联“红军在占领区政策尚不完全明了，但我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必须调派大批干部与相当数量的武装到苏军占领区建立党的组织和地方政权，发动群众与壮大力量，但“如果红军在政策上有所顾虑，须用很好的态度与他们商讨，并在红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工作”。^⑤ 在23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考虑到苏联当前态度，对于东北发展计划，毛泽东仍认为“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⑥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到，由于形势所迫，中共可能会让

①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2、115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6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给晋冀察分局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46页。

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52页。

出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但必须坚持在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古、东北等地占据优势地位。对于苏联不明确支持中共的态度,毛泽东认为,“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①

就在此时,美苏矛盾日趋明显化。从8月下旬开始,美国内部反苏呼声日涨,美国媒体认为苏联在战胜日本进程中没有发挥作用。29日,国务卿贝纳斯提议暂缓在华美军复员,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宣布美国海军仍将在中国华北登陆。预计苏军将在三个月内撤出东北与自身力量渗入东北的重要性,美国于8月底就决定开始实施协助国民政府运送军队前往东北的计划,9月18日,杜鲁门在致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的备忘录中表示:“在西太平洋的各陆海军部队司令已经接到指示,按蒋介石委员长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规定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②这对苏联的在华特权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有鉴于此,苏联暗地着手调整在中国东北的方针。为了协助苏军在中国东北的占领管理秩序和加强势力渗透,8月25日,苏军提议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八十八独立步兵旅部分主要成员^③进入东北,并将这些派往中国东北工作的人员皆提升为军官或授予更高的军衔,其中周保中被派往长春,李兆麟被派往哈尔滨,周保中等还被授予“红旗”勋章。^④同时,苏军对在东北被打散失去联络的中共部队亦予以适当的接洽与扶持。

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8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发出《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必须迅速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一些重要地区工作,以东北军或义勇军的名义,海陆并进,加速建立地方政权与地方部队。对于苏联的态度,中共中央虽并不明朗,但确信“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所以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或许“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⑤

正如中共所预料的,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很快就与苏联红军私下建立了友好关系。8月30日,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在苏军某部的配合下,攻克山海关,9月4日,在苏军同意下,接管锦州及辽西地区。7日,沈阳苏军在接到苏共中央指示后,接待了曾克林等人并建议将八路军番号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苏军远东司令部下达命令,“凡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对他们的行动,不要阻拦限制”。10日,曾克林等与来沈阳就任苏军驻沈阳卫戍副司令的原东北抗联冯仲云见面,继而与派来东北各地就职的原东北抗联负责人建立联络。这些在沈阳及分赴辽宁各地的中共部队,在积极接管城市、收缴敌伪武装过程中,接收了大量工厂和军用仓库,这样,中共“出关部队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辽宁省的局势”。^⑥

①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62页。

② 《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的备忘录》(1945年9月18日),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页。

③ 这支部队原系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940年在艰难环境中撤退到苏联境内,旅长周保中、政委李兆麟皆为中共党员。

④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69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65页。

⑥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18、225页。

9月11日，中共中央接到胶东区党委的报告，更加确定“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了在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发展与巩固中共在东北的优势，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要求迅速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由萧华指挥，以东北义勇军或其他地方军队名义，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在苏军的默许下迅速接收日伪政权，不断壮大自身力量。^①

但在此时，中共在沈阳等地的行动引起国际舆论及国民政府的关注。英美开始抗议苏联违背《雅尔塔协定》，在9月11日开始的伦敦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双方矛盾加剧。为了避免在华国际纷扰并加强同中共的谅解沟通，9月14日，苏军特使贝鲁罗索夫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一起飞至延安。朱德同意按照贝鲁罗索夫的提议，致信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答应按照苏军撤退前不得进入东北的要求，“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地点之八路军个别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但早在抗战爆发时就在热河、辽宁抗日的八路军某部“仍留原地”。^②同时，双方又私下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原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中共接管。

在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单独汇报后，刘少奇即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有利于中共在东北扩充军事力量，且东北“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千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③当夜，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统一领导中共在东北的工作。而且，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配备100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强调在不以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及与苏联不作正式接洽情况下，“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④

9月16日，中共晋绥分局转来消息，提到苏蒙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要求中共迅速派军全力占领他们即将撤出的察绥地区，包括不久后将要撤退的整个东北地区，且答应秘密提供相应武器方面的帮助，以确保中共在东北壮大力量，加强同苏联、外蒙古之间的交通联系。^⑤

面对前方传来苏军秘密资助的利好消息，中共决定调整受降战略方针，将重点放在东北、华北。9月17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并致电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等人，告知“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提议为了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二省且力争控制整个东北，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以避免地区太广、主力分散而陷入被动的局面。^⑥19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此战略部署。为此，延安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

① 《中共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75页。

② 《朱德给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信》（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79页。

③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36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配备一百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80页。

⑤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43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给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电报》（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82、683页。

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①

9月26日，刘少奇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等人：“热察苏、蒙军已得令暂缓撤退，并要我筹三个月粮食及补充冬衣，允我接收承德、平泉、赤峰等城”，且现已控制天镇、阳高、兴和、尚义、柴沟堡之线，又攻克怀来，伸至南口一带，且各部作战与开赴东北之军队进展一切顺利。^②同时电令华中局，“因目前谈判已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③苏联此时的对华态度，对中共占领东北是有利的，对国民党则造成很大影响，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苏联的态度及我们强大力量，更使之头痛”，^④这不仅增强了中共参与受降争夺的军事力量，而且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正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9月27日，毛泽东答英国路透社记者问中再次坚定地强调：“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⑤

三、苏联暗中支持与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

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开始实施在华北的登陆行动。10月1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等地。10日，又在青岛登陆，美国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接着进驻北平、青岛，帮助蒋介石进军华北与东北，这日益威胁到苏联在华战略利益与在中国东北的垄断特权。为了避免同美军直接冲突，苏联一方面严厉限制国民党在东北的接收行动，另一方面暗中增强对中共的支持，直接导致国共两党在华北、东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对于苏美矛盾，中共认识得非常透彻，认为对于美军登陆华北并协助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为此苏联对蒋的态度更加坚定强硬，至今不许蒋派一个人到东北去”。^⑥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张云逸、饶漱石、黄克诚等迅速派各部兼程北进。10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继续按照中央军委精神，“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而“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⑦

10月3日，苏共中央军委委员接见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在转达斯大林对中共赞美之外，建议中共应该立即“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用25万兵力镇守山海关与沈阳，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而不是纯粹以靠近边境的东西北满为发展目标，只有这样，中共才能真正控制整个东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85、686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部署给中共赴渝代表团的电报》（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98页。

③ 《军委关于必须控制江北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01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重庆谈判情况的第二次通知》（194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696页。

⑤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02页。

⑥ 《刘少奇关于目前形势与对美方给张爱萍的电报》（194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11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14页。

北政权。4日，苏方又通知东北局，愿意将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完全可装备数十万部队。^①

有感于苏联暗中全力支持，10月3日，彭真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在接收满洲的东西北部地区敌伪政权外，建议应“将主力布置于南部，并请中央以林彪所部控制山海关一带”。4日再致电中央，“苏方表示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个月内替我保存”，建议中共中央下最大决心，用尽一切办法，立即从各区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使之化为游击区，即使暂时丧失都值得”。^②

10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同日，中共指示胶东区党委并告山东、华东、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对准备在威海、龙口等地登陆的美军采取强硬态度，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并迅速在各媒体公布美军登陆进攻情况，以取得世界舆论支持，“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③同日电告东北局，决定抽调十万大军进入东北，同时在华北各地坚决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并要求东北局与苏军商议，希望其“能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我以必要的援助，使我在这些大冲突中获得大胜利，对东北及全中国的局势均将起大影响”。^④

10月10日，国共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中共仍然强调受降问题，要求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而国民政府表示中共如要参加受降工作，必须在已接受国民党中央命令之后。可见，中共合法受降权问题仍然没有结果。此日，苏联驻华使馆为即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设宴饯行，毛泽东在宴席上表示，“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但“中国共产党唯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并询问在场的苏联人员“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彼得罗夫与罗申表示：“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彼得罗夫还指出，如果美国出兵中共占领区，中共“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而且“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这些事实，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同时，在彼得罗夫表示担心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时，毛泽东告知在中共提出的所有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⑤

10月11日，毛泽东在回到延安后，立即组织讨论东北局势，同意东北局意见。15日，中共在上党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并决定华北、华中解放区应将战争重心放在铁路线上，以消灭和阻击北进的国民党军队，东北部队则力求封锁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16日，苏联坚决拒绝国民党军队在旅顺、大连、锦州与营口登陆，同时主动派一名代表与中共东北局保持密切联系。苏联向东北局表示，希望中共能更积极、主动地加大兵力投入，全力截断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路径，绝不能让国民党进入东北，并承诺协助中共解除反动武装，协助接收东北地方政权，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46页。

② 《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2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采取强硬态度拒绝美军登陆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16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十万大军进入东北等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17页。

⑤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85页。

彭真为此感叹苏方“上下都表现只怕我们不能在此成家立业”。^①

为争取全面控制东北与迟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中共决定在关内进行以控制平绥、平汉、津浦、同浦铁路为战略目标的战役。10月18日，绥远战役与津浦战役打响，接着，邯郸战役与同浦战役也相继展开。19日，鉴于国民党已知中共在东北建立武装而急派军队前往东北争夺之情况，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决定正式放弃过去确定的分散方针，改为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占领东北的方针，要求东北局必须“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对于北满、东满暂时只派少数人员及后到的少数部队前去开辟工作”。^②

此间，苏联亦严厉限制国民党代表在东北的接收工作，明确表示东北各省行政人员必须经过东北人民选举，这使得国民党在东北的工作进退两难；而对于国民党计划向东北空运部队，苏联规定允许国民党一架运输机前往，超过三架不得进入东北空域，而在东北的国民党代表因苏联限制，竟无一电给国民党中央。同时，苏方特别明告东北局，“如果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同意将已搬走的约五分之一工厂外，余下的均交给中共，弹药充足，仅抚顺一地就有300万发子弹，炮弹、飞机亦可交给中共处置，现已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的全部人员可供调遣，并保证在11月15日前，中共如遇国民党军队进攻，苏方决定协同阻击，唯迫切希望中共加快一切行动，并告诫中共应监视机场，防止国民党空运部队。^③

10月25日，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苏方情况，表示“苏方态度愈积极，关系皆好”，“诸事均督促我快些”，“劝我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并表示我可逐渐接收政府”。^④ 26日，彭真在沈阳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目前的任务是夺取东北，虽然苏联此时是东北的军事管制者，但其11月15日准备撤走，最迟12月2日完全撤离，且国民党在东北的代表与苏联关系不和，只能静候国民党中央指示，而苏联与中共关系密切，虽有《中苏条约》制约，但“苏联真心是愿我们胜利的”。^⑤

10月29日，彭真从苏方获悉美国、国民党军队准备在营口、葫芦岛两地登陆的情报，决定守住两处登陆口，击退他们的登陆。30日，国民党一部果然在美国军舰护送下准备在葫芦岛登陆，被中共驻守部队击退。王世杰请苏联令中共部队撤退，苏联回复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中共由此认识到，“似此如我在葫芦、营口、安东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⑥ 这样“可能迫使蒋军先在大沽、唐山、秦皇岛登陆，如此我可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待苏军撤退，立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中共中央电令刘伯承等配合布置兵力从外线夹击国民党军队，并尽可能派一部分兵力进入内线作战，“以利控制东北，建立百年大计之部署”。^⑦

① 《彭真传》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52—353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53页。

③ 《彭真年谱》上卷，第302—303页。

④ 《彭真传》第1卷，第356—357页。

⑤ 彭真：《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1945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67页。

⑥ 《毛泽东关于坚决作战控制东西北满给彭真的电报》（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75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增兵东北之部署给刘伯承等的电报》（194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76页。

11月3日，国民党军队在美军配合下进攻山海关，被中共军队击退。中共揭发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北戴河、山海关，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军任务仍限于协助国民党运兵、受降及运送日俘，绝不会出兵攻打中共军队。^①彭真和陈云于此日下午从沈阳乘苏军飞机赶到长春，与苏军进行两次会晤。在会晤中，苏方表示：苏军将按期撤兵，不能再推迟；在苏军未撤兵前，国民党军队不能在长春降落，中共可以作必要的布置。苏方还表示，他们撤走后，由指定代表与东北局联系，目前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入的地区，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5日，马林诺夫斯基通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拒绝派联络员会同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各省市，反对国民党收编当地伪军。考虑到苏联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采取强硬抵制及自身陷入中国内战的舆论危机，美国海军部进退两难，其在11月8日致国务院函中指出：由于营口被中共军队占据，苏联“宁愿由共产党的军队或非正规军在他们撤退时接管这一地区”，也“无意帮助国民政府军队重占满洲”，为了避免让苏联、中共军队以其“积极的军事行动参与了正在发展中的内战”为由引发正面冲突，决定停止用军舰帮助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的计划。^②

在国共东北争夺战打响的同时，两党的谈判继续进行，中共始终坚持先解决受降、伪军与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正式洽谈其他问题。此时的中共，对坚守山海关与占领整个东北仍然充满信心。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我们控制东北的可能性在增长”，^③已进入东北的军队有9万人，还有10万人在途中，接收了东北诸多敌伪政权与武器，等苏军11月底撤走后，包括长春、哈尔滨等全部接收完。苏军在东北，国民党军队不能空运，只能从山海关进入东北，所以中共必须坚守山海关。14日，中共中央指示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晋察冀局必须以锦州地区为战略枢纽布置工作，各地军队主力应积极援助锦州、山海关之作战，建立巩固的东北后方。

11月16日，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中共军队被迫从山海关撤退。17日，中共中央在得知国民党根据《中苏条约》规定，即苏军撤退五天前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并保障其安全等条文，准备空运部队至沈阳时，决定先用军队坚守以迟滞国民党陆军进军步伐，待苏军撤退后先消灭国民党空降部队，再集中主力在内线消灭其陆军主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一方面与苏方交涉，一方面准备重点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然而，令中共意想不到的是，此时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四、苏联外交妥协与中共在东北的战略重心转移

出于在华利益考虑，苏联一方面需要支持中共以牵制力图进入东北的国民党与美国军队，一方面须时时关注美国与国民党的动向与态度。在苏联看来，《中苏条约》是保障其东北权益与外蒙古独立的有力保障，而国民政府此时仍未公开承认外蒙古政权，苏联尤其担心美国趁帮助国民党出兵之机，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北。正如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向斯大林的报告所指出的，苏联绝对不容许苏联以外的其他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美国既想

① 《中共代表团关于谈判与宣传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89页。

② 《美国海军部致国务院函》（1945年11月8日），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第7—8页。

③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97页。

渗入华北，亦想渗入东北。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刚刚使我国的边界摆脱了邻国日本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允许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①

苏联对中共进入东北的态度时有变化。早在10月6日，由于美英等国舆论的压力，苏军曾强令中共李运昌部撤出沈阳，移往锦州。此日，彭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此事，并提出将东北局机构迁到锦州，但苏方态度很快转好，东北局未撤往锦州，仍留在沈阳城内。10月20日前后，苏方态度又发生摆动，暗示会将东北政权交于国民党，不支持中共接收抚顺政权，并将中共在东丰、西丰、海龙、西安、柳河等县的军队赶往城外，但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几天，苏方态度又很快好转。

进入11月份，美国和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正式提出要求其履行撤军和向国民政府移交东北政权的承诺，对苏联不断施加政治压力。10日，苏军突然通知在长春的陈云，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允许国民党向东北各大城市空运部队，并且不准许中共部队在此期间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发生冲突，如若发生冲突，苏方将会解除中共部队的武装。12日，苏军要求在长春城内的中共军队迅速撤出。

直到11月16日，国民党精锐军队才攻占山海关。面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全面受阻，蒋介石恼羞成怒，电令熊式辉将东北行营撤退到刚刚占领的山海关，同时向美国政府控诉苏联违约。17日，东北行营四百余人奉命乘飞机从长春撤出，宣布暂停接收，只留下国民党军事代表团与苏联继续交涉；美国支持国民党而谴责苏联违约，并派美国军舰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等港口附近海面示威。苏联感受到很大的外交压力，担心由此引起美国直接干涉，并给国民政府留下支持中共的“把柄”，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危及苏联在东北的既得利益。鉴于此，苏联重申支持国民政府合法接管东北，宣布暂缓从东北撤兵。同时，彼得罗夫在重庆多方斡旋，并拜访刚刚从南京赶回的孙科，请其从中调停，当孙科问及“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这是不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时，彼得罗夫则希望“某一国家的人民，应该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解决自己国家的内部问题”。^②

在外交斡旋的同时，苏联加大了限制中共在东北活动的力度。11月17日，马林诺夫斯基向在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指挥部下达命令，从长春、沈阳和哈尔滨撤出部队，并且不能阻碍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和沈阳。19日，苏军驻沈阳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上级已命令他们将长春路及沿线城市均交给国民党，令东北人民自治军退至50公里外，所有满洲境内中共军队在苏军未撤走前，均不准与国民党军队作战。25日，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告诉来访的王若飞，“为了不使自己遭到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中共最好不要占领长春铁路，因为那是商务线路，“国民党是不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军事行动的”，最后告诫王若飞“保持谨慎”，因共产党人受到严密监视，最近一段时期不要与在重庆的苏联任何公开机构保持直接联系。^③

对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采取理解并支持的态度，尽力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11月19日，在尚未得到苏联给东北局通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在目前苏联陷入外交被动、宣布暂缓撤退的情况下，认为“苏军延长驻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

①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98页。

②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机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93页。

③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机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95页。

是有利的。再有一个月我出动的部队和干部可全部到达满洲”，“你们现在的方针仍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①但到了20日，中共中央在进一步了解到苏联外交政策后，不得不改变力争东北大城市的战略，再次致电东北局：由于苏联决定，中共军队必须将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我们只有服从”，但应向苏联争取保留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并请其尽可能推延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如不能亦只好服从”，所以建议东北局务必制定新的战略方针，要求东北局及其部队主力应靠西满联系热河，并派军队建立东南满分局与北满分局，开展东满、北满工作，“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②24日晚，东北局机关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撤出沈阳。26日，中共发出关于撤退东北各大城市工作任务的指示，东北各大城市的党组织和东北人民自治军迅速组织撤退工作，并布置撤退后的工作事宜，至月底，从东北各大城市撤退的工作全部完成。

对于苏联的强力压制，中共内部也有诸多非议。11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目前“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③中共中央又在对各局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④

对于苏联的援共表现，在前线与苏联军队直接打交道的东北局更有切身体验。11月29日，陈云在总结东北工作经验时指出：“苏联力量的存在，对我在满洲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⑤同日，彭真在为东北局起草的指示中也指出，“这次撤退，并不是因为苏军之无理的限制或右倾，乃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顺利地对美、蒋进行世界性的外交斗争”，“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⑥

12月7日，中共中央经过全面考虑，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们亦不能完全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因此，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迅速扩大军队数量，建立巩固

①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08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路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10、811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应以控制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22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26页。

⑤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29、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28页。

⑥ 彭真：《今后工作的新方针》（194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33页。

固的根据地，“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①

正如中共所预计的，苏联按照《中苏条约》将东北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接收，因而1946年1月中下旬，国民党正式接管了长春、沈阳的警察及银行，对中国长春铁路实行中苏共管。在美军舰队的帮助下，到2月底，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总兵力已由1月的13.4万人猛增至28.5万人，而且企图以武力独占东北。这亦是苏联不愿看到的。是年2月，美英将《雅尔塔协定》公开后，中国爆发的大规模反苏游行及国民党一系列的反苏行为，愈发激起苏联对国民党的不满，从而再次增大了对中共的暗地支持，这客观上造成国共两党在东北庞大的军力对峙及日后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结 语

战后对日受降，是国共两党冲突的焦点，“围绕着受降的争论，是中国今天最重大最迫切的内政问题”，^②“为取得解除日本人武装的权力而发生的斗争，导致了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③这是国共两党诸多领导人切身感受到的现实问题。但国民党试图在美国支持下，垄断对日受降权，以完全限制中共在战后的进一步扩充，这势必激起中共的强烈反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最直接的原因来自《雅尔塔协定》带来的巨大利益，并力图通过《中苏条约》巩固这一既得利益，然而美军在中国华北及东北的战略扩张与国民党的一系列违背苏联意旨的行动，直接危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垄断权益及其远东安全战略。苏联迅速作出回应，在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与不明显违背《中苏条约》的基础上，不断暗地支持中共参与东北受降之争，以达到制衡美国独霸中国的计划，从而形成美苏在中国争霸背景下的国共直接军事冲突。事实上，中共在抗战期间就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性极强的成熟政党，军事力量亦不容小觑。中共完全有资格参与对日合法受降，即使受到国民政府与美国的打压，但中共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同时，在战后受降期间，中共全面、准确地把握国际局势，充分借助苏联与美国、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尽量对美国保持中立，在某些方面坚定地与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不断得到苏联的暗中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势力日益壮大，其间虽不时受到苏联的压制，但根本无损其军事力量的扩大以及同国民党全面对抗能力的发展。

〔作者周锦涛，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湘潭 411105〕

（责任编辑：武雪彬）

①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50页。

② 《朱德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美军在华行动的态度答外国记者》（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816页。

③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机密），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93—94页。

periods, but was replaced alternatively by “restraining commerce” and “allowing commerce” from the time of Warring States and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resurrected in the Song, when “restraining commerce” and “developing commerce” entered a new phase that lasted to the Yuan dynasty. Under the Ming, the policy of restraining commerce still existed, bu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t had become a spent force, while the policy of developing commerce had been implemen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permeated many Ming economic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The curtain fell on the policy of restraining commerce no later than the Wanli period, with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the policy of developing commerce. The “valuing commerce” approach was simply an element in and surface manifestation of “developing commerce.”

Chinese Coolie Deaths in the 1850s and Their Impact on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Tang Shuiqing (54)

In the 1830s and 1940s, after the British and French had abolished slavery in their Latin American colonies, Western colonis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ok a number of measures to actively recruit Chinese laborers. The large profits and lack of supervision made the organizers of such shipments ignore the conditions on board and the state of coolies, leading to the frequent large-scale occurrence of deaths at sea. In 1850, the deaths of Chinese coolies on the British ship “Lady Montagu” shocked British society. This incident and its successors mad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hange the policy of not intervening directly in coolie emigration and established a government agent emigration model that not only avoided direct clashes with Chinese law but also supervised and checked coolie emigration and drew up laws governing the situation, in an attempt to control and manage illegal coolie emigration on British ships, in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and in the Chinese treaty ports, and to reduce deaths in transit. This had a certain effect on reducing coolie deaths at sea, and also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legalization of coolie emigration.

The Dissemination,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Xiandaihua 现代化)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ang Xingtao and Chen Peng (70)

“Moderniz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It first took off in China in the late 1920s and early 1930s, in multipl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texts that merit study. When the concept was introduced, it was applied in pursuit of the overall call for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expressed a comprehensive intellectual trend that synthesized 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There was not, as previous scholars thought, a clear change from valuing culture to valuing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term spread even further afield and intellectual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also deepened,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was not then a conscious propositio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Kuominta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used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to carry out social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even history wri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ideologies. History writing on the lines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model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not only applied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but also concerned itself with 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Acceptance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Zhou Jintao (91)

After 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he issue of who would accept the surrender became the focus of a struggle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aring in mind specific Soviet interests in China, the Soviet Union explicitly supported the KMT as the legitimate actor in accepting the surrender.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ly evid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especiall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he KMT, the Soviet Union’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and its privileges in China were threatened, which led to there thinking of Soviet China policy. Although it still nominally recogniz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KMT as recipient of the surrender, it in fact mounted a strong resistance to the KMT takeover of the Northea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ing its suppor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s armed move into the region.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the Communist Party utilize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on one side and the KMT and the US on the other. Making a timely adjustment to their strategy for acceptance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the Party largely realized its strategic goals in the Northeast and gained the initiative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KMT.

A View of Exchanges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of Greece and the East in the Early Archaic Period

Li Yongbin (105)

Greek writers of the archaic period and classical antiquity recorded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Greek civilization and those of the ancient East, but the paeans to Greek civilization of some orators and politicians in late classical antiquity ignored these contacts. In early modern times there was a surge of interest in the uniqueness of ancient Greek culture that deliberately skir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ancient Eastern civilizations on Greece. From the 19th century on, scholars started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the Oriental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 but some went to extremes in emphasizing the Oriental factor. Studies of the Phoenicians and the Al-Mina site reflect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of Greece and the Orient. Related thinking revolving around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the great gap” and connecting up “the great gap”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history shows that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early Greek history have changed from being founded on written sources to being founded on archaeology, and thence to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n Analysis of Greek Exil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Persian Empire

Li Lihua (120)

Scholars have generally assumed that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Persian Empire, Greek exiles held lower official positions and were as a whole excluded from the Empire’s substantive bureaucracy, limiting their political role. Nevertheless,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Graeco-Persian relations, th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ivilizations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exiles, even without high office, to participate in handling Greek affairs that concerned the Persians and even occasionally in non-Greek affairs. In political practice, they proffered suggestions and proposals, and were thus highly valued and well treated by the ruler. The loose nature of the Persian bureaucracy provided opportunities and space for Greek exile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Greek affairs were a priority area for the Persian Empire, so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Greek exiles in the Persian political system deserves further attention.

Academic Review

Paradigm Construction,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History of Western Art

Liu Jun (135)

The centurie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ere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construction,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early modern Western art histo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lassical art history tradition. The art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ombined a biographical form of art history and an antiquarianism that include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both of which were widely diffused in Europe.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 Prussian art historian Winckelmann creatively combined the two types of history on a foundation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On this basis, Hegel developed the history of art into a history of the spirit. At this point, early modern Western art history constituted a coherent tradition of “classical art history.” The paradigm of ancient Greek and Italian Renaissance art was established and generally accepted, and it was classical aesthetics that came to dominate the writing of art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with the rise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art in modern universities,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history.

Historical Notes

Garrison Agriculture in the Frontier Forts and Western Regions under the Han Dynasty’s Emperor Wu: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ing to Garrison Fields in Luntai and Quli

Dawulijiang · Ye’ erhalike (154)

Details of the System of Measurement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Explaining “Ulaci”

Han Jishao (167)

Zhang Jian (178)
